

古典考古三题

吴丽

一般来说，古典考古指的是对古希腊与罗马物质遗存所进行的专门研究，是欧洲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原因在于，欧洲人对古典文化十分尊崇，认为拥有古典时期的知识是高品位与社会地位的象征，同时也是成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欧洲人的重要标志。所以，来自古典时期的物品很受重视。人们不仅致力于从古物身上提取能够解读过去的信息，还热衷收藏古典时期的艺术品以彰显自己的修养与品位，同时将此作为教育内容之一。中国考古学虽暂且没有专门的“古典考古”研究，但中国历史时期古物在这一点上具有巨大研究潜力。并且，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也离不开对古物文化意义的挖掘。基于该背景，深入了解古典考古的渊源、目的以及思考如何开展中国的古典考古具有特殊意义。

渊源：古典考古与古典古物学

最初，人类对物质遗存的理解充满神话与宗教色彩。来自过去的物品被认为拥有某种魔力，能给人们带来各种好运。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开始用世俗性的眼光看待物质遗存，将之视为了解历史的材料。进入中世纪以后，人们虽然对古物的兴趣不减，注意搜集铭刻、钱币等物品，但通常是把它们当作与宗教相关的圣物，或者支撑自己某一主张的证据。直到文艺复兴，欧洲人对古物的态度才逐渐改变。这场运动不仅激发了人们对古典世界的兴趣，也重塑了人们对古物的看法，古典古物学随之而来。

在文艺复兴之前，欧洲人并未意识到自己生活的时代与古典时代存在什么区别。但随着对过去的了解逐渐深入，这一认知最终被摧毁。改变首先发生在意大利，这里发达的商贸经济孕育了一批新兴城市，为了赋予这些新生的事物正当性，使之合理化，人们将目光投向留存下来的文献书籍。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人们发现过去存在着一个十分光辉的时代，这一发现使希腊文献获得了大量关注。15世纪后，对古典文献的兴趣转向古典时期物品。在这之前，来自安科纳的意大利商人西利亚库斯就在游历中对古物多有注意并进行了记录，但古物学的真正兴起要到15世纪晚期之后。丹尼尔认为，来自古典世界的古物被大量发现是古物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视野变化，意大利此时掀起了一股古物收藏之风。王室、贵族等身份显赫的人士是收藏队伍里的重要成员，他们一方面致力于古典世界艺术品的收藏，一方面又赞助他人从地下获取这些古物。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古物不仅是文献之外理解古典世界的材料，更是修养与地位的体现。有条件的人热衷于收集古典雕像来装饰居所或欣赏，从而展示自己高尚的品位。而实地参观古典时代留下来的物质遗存，也成为教育的环节之一，对塑造人们的精神世界具有独特意义。从16世纪到18世纪，人们对古典艺术品的收藏热情不减，风气从意大利蔓延到了整个欧洲。与之相伴的是，人们对古物的研究也从描述逐渐走向深入，古典考古孕育而生。

一直到18世纪，人们对古物的研究都侧重艺术角度。分析古典艺术品的美学风格或者将它们相互比较是主要研究内容。这样的研究十分依赖文献记载，没有铭刻或文献未提及的古物往往令人感到苦恼。但研究者一直在尝试克服这一难题，如弗朗西

斯科·比安东尼意识到图像能够提供十分重要的信息，由此开启了古典肖像学研究。蒙福孔在其《古物说明与图版描绘》中强调了器物互相比较以及史物互证的重要性。但正如特里格所说，当时的学者都只能借助历史文献为这些艺术品断代，直到温克尔曼才解决了古典艺术品的年代问题。古物学家温克尔曼在《古代艺术史》一书中根据古典雕塑的形制特点与相关历史记载，将古典时代的艺术风格分为四个时期，这使以后的古物研究有了可以参照的年代框架。但需注意的是，此时研究者在获取古物上依然是缺乏科学性的。一直到19世纪，古典考古学家在发掘时引入地层学知识与绘图技术，科学的古典考古才真正到来。

目的：古典考古与古典文化

尽管近代欧洲与古典时代存在文化上的断裂，但14世纪之后人们一直试图为两者建立联系，从而复兴古典文化，以回应现实生活的文化需求。可以说，古希腊与罗马虽然已经覆灭，但其留下的文化遗产依然是欧洲文化的重要渊源，不断受到后来者的推崇，对现世有重要指引。比如德国的威廉·冯·洪堡就认为古典文化在现代世界依然十分光辉，以古典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与艺术为基础给18世纪的高校设计了一套课程，用来培养未来的官僚。而古典考古学家的研究目的也不仅仅是通过物质遗存认识古典时代，他们还希望借助这些物品为当下的生活提供某种参照。这一特征在古典考古还没有那么成熟的时候就已经显现，英国威廉·汉密尔顿爵士的实践就是十分生动的例子。汉密尔顿爵士是18世纪希腊陶罐的重要关注者之一，他在那不勒斯居住的时候收集了大量希腊陶罐，并出版了图录。汉密尔顿更多是从美学角度来看待这些带有彩绘的陶罐，同时希望自己的收藏品能够成为当时艺术家的创作范例。事情的发展如他所愿，英国陶器工厂后来就以此为参照生产了古典风格的陶器。而欧洲此后也出现了希腊陶罐的收藏热潮。

总体来说，由于古典文化对欧洲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及人们对古典物品的研究倾向，古典考古更多是与古典学、艺术研究联系在一起。从现代社会的角度看，来自古典世界的建筑、雕塑或其他物品，一方面承载了过去的信息，是认识古代的重要媒介，这种价值通常需结合文献来充分认识。另一方面，它们体现了古代理人的审美追求，这种追求深刻影响着欧洲现代社会的审美观念。概言之，欧洲现代社会的价值观与文化观是通过学习与吸收古典文化形成的。古典时代残留下来的物品就是重要媒介，而古典考古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方法：中国的古典考古与金石学

欧洲的古典考古实践说明，物质遗存不仅有助于了解过去，对现代社会的文化建设也具有特殊意义。如今，中国的文化建设已经进入新时代，如何更好地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当下的重要议题。缘此，发展中国的古典考古具有重要意义。

古典考古可以作为阐释中国古典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众所周知，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文献记载最早的王

朝可以追溯至夏，历史最早的纪年可以追溯到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已形成了完善的文化体系，它指导着后来的社会运行并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影响深远。可以说，这套文化体系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引领着古代社会的道德与价值追求。古人通常将其称之为“道”，明“道”与弘“道”是古代士人的毕生理想，《论语》中就有记载：“朝闻道，夕死可矣。”说明了“道”的重要地位。先秦以来的经书典籍是它的主要载体，零星发现的古物也是它的载体，古人一般通过研究这两种材料来理解并传扬这套文化体系。这一特征就使研究者可以通过考古学来认识中国古典文化，从古典考古的角度揭示古代人的精神世界与价值取向，以此为现实社会的文化建设提供养分。

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对物质遗存承载的文化意义给予更多关注，也需要调整解读文化的方式。因为古典考古所追求的，不仅仅是客观地描述物质遗存的发展与演变历史，还有阐释物质遗存被赋予的文化意义。这是文明社会古物所具备的最重要的价值，人们应该对这一点给予更多重视。古物承载的文化内容与它的制作背景、制作者密切相关，这要求研究者应结合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背景来解读古物，从而科学认识古物背后的文化意义。正如古希腊存留下来的雕塑具有不同的艺术风格，反映着不同阶段的审美倾向。中国的古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承载的意义也是不同的。

那么，中国的古典考古又要如何有效挖掘古物的文化意义？这或许可以从金石学中获得借鉴。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前专门研究古器物的学问，现代化的浪潮已使它被束之高阁。但如今看来，金石学在解读物质文化意义方面进行的探索是十分可贵的。总体而言，金石学家将古物视为了解古代的重要材料，他们则主要通过古物去了解前代的社会规则，礼仪秩序以及道德理想、精神追求等内容，并试图在当下的社会恢复，以此解决现实存在的某些问题。比如，北宋学者张敞研究古器物抱有“明其制度，正其文字，次其世谥”的心理，吕大临有感于社会秩序混乱，三代礼制不兴，寄希望于通过研究三代铜器恢复先王之法、圣人之言。除了借助古器物传承、弘扬道统之外，金石学家也注重依托古物陶冶精神、传承审美。这一点主要表现为他们对古物美学价值的重视。如北宋王黼在《宣和博古图》中注意描写青铜器带来的视觉感受，清代金石学家在墨拓石碑文字时追求还原碑文字体，从而探索出了蝉翼拓、乌金拓等精湛的墨拓技术，再现前人书法造诣的同时也引领了审美。金石学致力于以古器物认识并传承古代文化，对于发展中国的古典考古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小结

中国古典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是我们能称之为“中国人”（不仅是地理意义）的关键，但民国时期所遭遇的现代化浪潮使其并未得到很好的继承与研究。如今，建设新时代的中国文化体系需要对此给予更多重视。从考古学的语境出发，发展古典学能够从物质角度促进古典文化的认识与传承，发挥古物的现实价值。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制度·技艺·融合：试析《营造法式》在金代太子城遗址中的应用与探索

司晓红

李诫所著《营造法式》刊行于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是中国古代由官方颁布最早、体系最为完善的建筑营造专著。该书系统记录了宋代建筑的设计规范、施工工艺、用工定额及图样等珍贵内容，堪称中国古代最杰出、最完整的建筑学经典著作，对于研究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观念与诉求等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北宋时期，由于各类建筑工程缺乏统一的设计标准与施工规范，故北宋元祐六年（1091年），由哲宗皇帝下诏颁行，将作监首次编制《营造法式》，史称《元祐法式》，又于北宋圣宗四年（1097年）诏李诫重新编修，李诫以自身10余年修建工程经验为基础，参阅大量文献和旧有规制，收集各种操作规程、技术要领，总结各建筑构件形制与加工方法，最终完成流传至今的《营造法式》。全书共36卷，357篇，3555条，其中总释并总例2卷、制度15卷、功限10卷，料例并工作等3卷、图样6卷，目录1卷。该书不仅是对宋代建筑实践的系统总结，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工程技术与管理思想的重要文献，对后世建筑学、历史学、艺术学等研究影响深远。

《营造法式》于北宋崇宁二年正式在官式建筑中应用，但仅20余年后，其在北宋的应用便随着靖康二年（1127年）北宋灭亡而结束。而关于金王朝对北宋建筑体系的传承和对《营造法式》的实际参考应用，则可从相关文献记载与现存金代建筑中得到线索。在文献资料方面，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金人）又要御前后苑作、文思院、下界明堂所、修内司、军器监工匠、广固搭材兵三千余人，做腰带、帽子、打造金银、毛笔和墨、雕刻图画工匠三百余家，令开封府押赴军前”；“又押内官二十八人百仗工艺等千余人赴军中”；“又取画工百人，医官二百人，诸般百戏一百人，教坊四百人，木匠五十人，竹瓦泥匠、石匠各三十人。”据《癸辛杂识》记载：“及金海陵修燕都，择汴京版户刻镂工巧者以往。”《揽辔录》载：“杨王亮始营此都，规摹出于孔彦舟，役民八十万兵夫四十万，作治数年，死者不可胜计。金朝北官营制宫殿，其屏宸窗牖，皆破汴都肇致于此。”《元一统

志》载：“海陵意欲徙都于燕，乃命左右丞相张浩、张通、左丞蔡松年，调诸路民夫筑燕京，制度如汴。”上述文献资料表明，金灭北宋后，金人有意将北宋包括建筑匠人技术力量在内的中央官作体系迁往北方，促成北宋建筑制度向北方地区的扩散和流通。可以说，金海陵王迁都燕京时，无论是都城规划、建筑工艺方面，还是关键匠人的来源出发，金中都的营建均深深植根于北宋汴京的传统建筑营造模式，甚至部分建筑构件直接取自汴京旧宫。现存金代建筑方面，从目前对晋东南地区宋金建筑分期研究中可以发现，该地区自北宋宣和年间起，斗拱形制已逐渐向《营造法式》主流形制靠拢，宋金政权交替并没有打断这一进程，至金大定时期，晋东南地区的斗拱形制已与《营造法式》取得了高度一致。总之，《营造法式》的相关建制在金代得以承继，尤其在大定以后，大量金代官式建筑的营造均可以从《营造法式》中找到源头。因此，对金代建筑，如太子城遗址的复原研究，以《营造法式》为研究依据是具有充分文献资料与实物资料基础的。

从太子城遗址发现和出土的泥质灰陶瓦作类建筑构件，有鸱吻、垂（戗）脊兽、蹲兽、螭吻、套兽、瓦当、滴水等多种类型，《营造法式》中对以上构件均有明确制度等级的规定，通过对考古发掘实物与《营造法式》记载的相互比对，可进一步分析出金代官式建筑对北宋官式建筑承继和革新具体内容。以“鸱尾之制”为例，太子城遗址最重要的南北轴线清晰体现了金代建筑等级秩序的要求，其以南门（四尺五）-9号基址（七尺五）-60号基址（五尺五）-3号院落（四尺五）的轴线明确划定了太子城遗址的等级规制，其他一般基址作为轴线附属依次展开，主次分明，错落有致，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特有的空间秩序与礼制内涵。然而，太子城遗址中也存在若干与文献记载或同期都城制度不符的现象。例如太子城遗址寝宫三处院落东西排列，核心三号院落位于轴线的方式，不见于同期的辽、金、元都城寝宫布局；作为皇室建筑仅使用少量绿琉璃构件；作为前朝区核心的9

号基址仅面阔三间进深四间，遗址正门南门则仅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就其皇帝行宫的建筑性质而言，其结构布局与规模大小都过于简素，与传统宫廷建筑等级规模及礼仪制度不符。针对这些特殊现象，可推测出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作为行宫，太子城在营造制度与规格方面的安排明显具有更高灵活性，统治者可根据实际需要与爱好决定一定的建筑形制与空间布局安排，不必完全遵循都城的严格规范。其次，该行宫遗址营建于金代中后期，虽继承北宋《营造法式》的基本营建制度，但在发展过程中很可能结合自身文化面貌进行适当调整，故在形制安排上更具游牧民族文化底蕴。最后，太子城地处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其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可能也对建筑形制与材料选择产生了一定影响，促使其在营造过程中作出适应当地自然条件的变通处理。

研究表明，太子城遗址的建筑布局、构件形制与营造技艺等方面，均体现出对《营造法式》核心制度的继承与遵循，尤其在等级秩序、用材制度与标准化生产等方面表现出与宋代官式建筑的密切关联。然而，太子城遗址亦表现出典型的在地化特征与建制创新性应用。故其建筑群组布局、建筑规模与装饰等级等并未完全拘泥于《营造法式》的成规，反映出作为行宫类建筑的政治象征性与功能适应性的兼具。此外，在材料选择、构造细部与空间功能组织方面，亦可见到北方民族审美偏好和环境地域适应策略的深刻影响。这一案例表明，金代在吸收宋代先进的营造制度的同时，并未进行简单复刻，而是基于其政治需求、文化传统与地理环境，进行了一系列创造性的转化与调适，体现出多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下建筑营造体系发展的活力与适应性。太子城遗址亦因此而成为研究《营造法式》传播、应用与演变的重要节点，为理解解宋金时期南北建筑技术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关键实物证据，也为深化研究学者对金代建筑成就的认识，探讨中国古代官式建筑的传承与创新机制提供了重要参考。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学术动态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与高等教育实践育人的政策精神，推动考古学专业实践教学高质量发展，9月16日，由浙大城市学院艺术与考古学院主办的“田野考古实习基地建设研讨会”在浙江杭州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吉林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科研机构，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学会等行业协会的专家学者50余人与会。

浙大城市学院校党委书记董悦、浙江省文物局局长朱海闵在致辞中先后介绍了学校、省文物局对浙大城市学院考古系建设发展、实习基地建设的支持情况。

主旨发言部分，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关强着重就田野考古实习基地建设提出几点建议。他说，田野考古实习是考古专业培养的核心环节，建设高标准、功能完备、可持续运行的专业考古实习基地，对提升考古教学质量至关重要。一是要充分认识田野考古实习基地建设的重要性。当前我国考古事业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对考古人才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综合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的临时性的实习基地，条件难以满足稳定教学、深度研究和安全保障的需要。建设规范的田野考古实习基地是保障田野考古实习质量，实现考古学人才培养目标的必要条件。

二是要科学审慎做好实习基地建设选址工作。基地选址必须着眼长远，要确保建成后能够长期发挥效应，要首选具有一定规模、内涵较为丰富的大遗址，为师生提供长期系统深入的田野考古实践平台，并确保选定的地点能够保障实习工作长期稳定安全地开展。

三是要高标准推动实习基地建设。实习基地不能仅仅是简单的设备营地，而应该建设成为集教学、科研、后勤保障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首先要满足实习的教学功能；其次要具备科研功能；三要有较为完善的生活保障功能；四要建立完善的的安全管理制度。同时，鼓励在基地规划中预留或建设适当的开放展示区域、研学体验空间，积极承担向社会传播考古知识、展示考古成果的功能，促进考古成果社会共享。

四是要创新教育共建机制。高校要积极沟通遗址所在地的人民政府、文物部门和考古研究机构，构建各方共建模式，积极争取中央和地方财政经费、学校配套资金的支持。同时要深化校际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各方要在考古项目申报、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方面深度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在做好高校人才培养的同时，也为地方文化建设、基层文博干部培训发挥积极作用。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张弛结合国家文物局2024年度高校田野实习检查工作，介绍了高校田野实习和基地建设情况。高校田野实习检查工作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遗址评估，遗址难度要适中，不能特别复杂或过于简单，遗址面积要大一些，适合长期实习；二是实习管理，实习队伍师生比一般应达到1：6，最低不能少于3个老师；三是教学实习，田野教学理论课程、田野发掘实操、发掘报告整理三部分教学内容的学时比例要适当；四是田野实习基地建设、装备情况、教师绩效考核等。总体来看，各高校实习工地管理、基地建设方面差别较小。差别较大的一是遗址的选择，有的过于简单，有的过于复杂；二是教学内容的比例问题，部分高校对整理发掘报告重视不足，甚至只留一星期时间写一简短报告，报告撰写也有差别，建议至少应达到学生分组撰写分区报告的程度；三是教师绩效评估问题，不同高校田野实习对应的学时从1000多个到100多个不等。他还着重探讨了田野实习的教学理念、实习内容等，提出要引导学生在聚落考古角度思考遗址的发掘，要注重教学内容的详略和范畴，至少应保证前沿发掘实操、器物整理分期排队年代学训练两个核心教学内容的完整性，要加强田野信息系统的使用，同时应适当考虑遗址的保护展示和公众考古问题。

学术交流部分，浙大城市学院教授杜正贤介绍了浙大城市学院考古专业建设情况。2021年，浙大城市学院抢抓历史机遇，主动承担起高校应有的社会责任和时代大任，积极筹建考古学本科专业。2021年8月，浙大城市学院与浙江省文物局签署考古学系共建协议，正式向教育部申报增设考古学本科专业。2022年4月，获教育部批准，于9月招收第一批本科新生。2023年，获批准考古学浙江“省一流”B类学科立项、考古发掘资质证书。2024年，“文物”专业硕士点获批，建立浙大城市学院长兴新安遗址考古基地。四年时间，从无到有，浙大城市学院一年一个台阶，形成了以田野考古为核心，系统完整地教授考古专业知识，以“新石器时代考古”“城市考古”“陶瓷考古”为重点建设方向，与科技考古、文物保护形成融合发展的课程体系。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从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具有哪些特殊性、旧石器考古教学该如何有效进行、田野培训中旧石器考古可以承担何种角色三个方面，讲述了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特性和独特价值。他认为，旧石器考古内容涵盖人类历史99%的时段，是史前考古的基干部分，需要广泛借助自然科学的理念与方法，具有强烈的交叉学科特点，高度依赖现代科技分析手段。从事旧石器考古教学与科研的专业技术人员相对较少，学科入门和驾驭的难度相对较大。具体研究中，没有古文献资料可供参照，对田野工作的依赖程度更高，需要更精细的田野工作。同时，旧石器考古国际化程度高，具有人类共通性和跨区域关注度。针对这些特性，旧石器考古教学需要专业的教学人员，以“问题—兴趣”为导向，侧重理念方法与研究过程，先观森林，再看树木，配合鲜活的研究案例，注重田野实践与实验模拟。充分发挥旧石器考古教学与田野培训的特定作用，使我国考古研究与教学体系更加健全、完善。

教育部历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西北大学教授陈洪海重点介绍了西北大学考古学专业和田野实习基地的建设发展情况。一是在区位优势 and 学术传统上确立方向。西北大学依靠陕西以及西北地区的文物考古研究资源、行业人才队伍资源，建立了周秦汉唐历史与考古的学术传统。立足长安，开展周秦汉唐考古研究，面向西域，拓展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二是适应国际趋势，服务国家需求，构建以文化遗产价值为核心的认知（考古学研究）、保护（文物保护学）、传承（文化遗产管理）“三位一体”的学科体系。三是认清现实，找准定位，面对生源、师资、经费等问题，适当扩大办学规模，面向基层、争取高端，国内联合、国际合作，把学术传统发展为学术优势，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学科优势。四是以田野考古实习为专业立足之本。实习基地建设是考古实习质量的基本保证，要选择内涵丰富的大遗址、类型多样的遗址群，距离适中、满足基本的生活学习条件，要组织充分的指导力量，配置合理的仪器设备。田野考古实习是各环节田野考古技能的实践训练，要制定量化考核标准，教师教学与科研形成有机结合。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罗汝鹏、长兴县文旅体局局长黄文娟介绍了浙江省、长兴县开展的相关文物工作情况。厦门大学教授张闻捷、吉林大学教授林森、安徽大学教授张爱冰、郑州大学教授张国硕、北京联合大学教授宋国定、浙江大学教授林留根、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志高等也先后交流发言，介绍了各自学校考古专业和田野考古实习基地的建设情况。

会后，与会专家学者考察了浙大城市学院长兴新安遗址考古基地。

田野考古实习基地建设研讨会纪要

王龙霄